

以誰作為方法？：從文化研究、亞洲研究到臺灣研究 XX as Method?: A Journey from Cultural Studies to Asian Studies and Taiwan Studies

陳佩甄*

Pei-Jean CHEN

這篇文章寫了一年半，比所有期刊論文都難。因為回顧文化研究20年，必須先回看自己的學習歷程，這就不免要撿拾個人研究歷程裡的麵包屑，也就不時生出各種情感與情緒。從碩士班開始起算，自己的研究歷程剛好與臺灣文化研究發展的時間交錯交織了15個年頭。回看這15年，我暫時定義自己一直在一個「跨」的狀態裡，特別是「跨領域」與「跨區域」研究方法與對象的摸索與學習；也一直在「以誰作為方法」的提問裡，不只經常問自己、也時常被提醒。一年多寫寫停停，我想就以這篇文章當作自己的研究心得的階段性整理，也片面呈現文化研究在臺灣、在我身上刻下的年輪。

一、研究的碎片

「文化研究學會」在臺灣創立那年(1998)我剛進大學，在以語言訓練為主的外文系就讀期間，萌生了對英美文學的遲疑和對性別研究的興趣。大學畢業後工作的那一年，我想著要繼續讀書，但眼前的各學科系所好像都不是我想要的；在獨立書店的讀書會裡，畢業學長介紹了那時才剛草創的

投稿日期：2019年9月25日。接受刊登日期：2019年10月25日。

*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。

電子信箱：enochen@nccu.edu.tw

交大社會與文化研究所（以下簡稱「社文所」）。2003年進入社文所就讀的三年間，理論知識爆炸、如修輔系一樣地參與各種社會議題，理論實踐一起碰撞，生出各種問題和想法，最後從文化翻譯的角度討論臺灣同志論述，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。2006年畢業後在所謂的文化產業工作，四年間從文創公司、出版業到獨立媒體，研究所的訓練一直緊跟著，那是對「知識」的一種警覺。2009年我感到一種要滿30了，可以進入下一階段的土星驅力，經過各種條件判斷、資訊收集與釐清，決定選擇赴美讀東亞研究。2010年至2016年間在美國亞洲系攻讀博士，期間我確實感到在臺灣的訓練幾乎得以與美國研究所學習無縫接軌。2013年博士班資格考後，我已打定主意回臺；之後完成殖民臺韓比較的博士論文，於2016年畢業。回臺後在中研院作博論後，一年多內整理博論、儲備新的研究計畫，等待心儀的工作開缺，直到2018年2月進入政大臺文所服務。

上述各階段的時序碎片總和20年，與臺灣文化研究學會平行，且在自己的知識訓練上也完成了階段性的過渡：從文化研究、亞洲研究、到臺灣研究。這三個學科看似自成一個領域，其建制化卻有著奇妙連結。對我來說，這三個領域就時序上倒著看也行，但更精確的回望，它們其實同時發生在我的知識進程中，像個有機的迴圈不斷復返。最具體的例子是，我在社文所修課期間修習了一堂奠定我碩論題目的課程「東亞現代性與文化翻譯」，也是我到了臺文所之後開的第一堂研究所專題課；「臺灣文學」的體制化亦發生在我真正開始「做研究」（如2003年國立臺灣文學館成立）後，並承接了要開始「做老師」的我。除了這些體制面的迴向，「文化研究」進入我生命後，留下的更是義大利哲學家 and 作家艾可(Umberto Eco, 1932-2016)在〈如何寫論文〉(“How to Write a Thesis,” 1977)¹中所提點的：「論文代表著自我實現的奇妙進程，帶著謹慎與好奇介入自身所處的世界，且這不需在二十幾歲這個階段結束。」²我將進入社文所就讀那年定

1 Eco, Umberto. 2015(1977). *How to Write a Thesis*. translated by Farina C. Mongiat and Geoff Farina. Cambridge, Massachusetts : MIT Press.

2 原文：“the thesis represents a magical process of self-realization, a kind of careful, curious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that need not end in one’s early twenties.”

爲自己的「文化研究元年」，也與同年級的同學戰友們一起琢磨著對這個學科的想像；他們當時的研究題目（如臺客、海洋音樂季、壯陽藥、社區營造、村上春樹讀者研究等）一直都是我想像「文化」的重要參照。那時我還不算開始想像「臺灣」，而「亞洲」也還在發生中。

二、以誰作爲方法？

碩論其實始自一個素樸的提問：我所感興趣的性別研究在臺灣爲何總是要讀那麼多的「西方理論」？所以碩士論文切入的角度是把當時（同志）論述發生的「方式」與「結果」做了梳理。現在看來只有在「文化研究」領域能讓我發展這樣的提問，並且提供我「脈絡化」問題意識的方向與方法。我問的問題不是針對「性別」而已，那還反映了我作爲研究生的（焦慮）位置、既有學科建置的問題、「臺灣」研究的複雜性、乃至各種認同政治交雜在一起的歷史時刻。我清楚感受到文學研究、性別研究、臺灣史與文學等各種學科都匯集到我的提問裡，解嚴後乃至2000年後的臺灣或同志、是一起長大的但又時常互相鬧脾氣的夥伴；我更清楚發現到研究生的理論焦慮，從來不會在課堂上被處理（相比於寫論文那時要畢業的焦慮），也察覺自己外文系的訓練很可能是一種研究「不適」的因素。

而我所認識的「文化研究」在一開始就有個「亞際面孔」。當時已形成的「亞際連結」協助我打開一個屬於研究生的學術群體。我在碩士期間前往首爾開會時認識了一群至今仍經常來往、合作的韓國女性主義研究者，在她們身上感受到非常親近的成長焦慮（認同、學術皆有），共享一種感覺結構。但這個「亞際連結」又帶來另一組焦慮：我們透過「亞際」見面，但大多時候各做各的研究，和韓國朋友、印度朋友見面還是得說英文。所以我那時總想著「哪一天要開始學韓文」，想要寫一篇韓國的女性主義與性論述論文，想要更了解那裡的同志運動。那時我是會扛著所辦借來的攝影機記錄同志遊行、去樂生療養院聽歌和上課、跑各種影展的研究生，而我發現我的韓國朋友們也是這樣的。最終我並沒有正式地在碩論展

開關於韓國的這些問題，當時也沒有能力想像其他可能的共同體。

儘管如此，完成碩論畢業後依舊會想著當時研究的內在命題：「西方（理論）總是、也必須在那裡」，也注意到「當時不做那個題目，之後就不會做了」的社會轉型關聯。因為論述的出現是有趨勢傾向的：性別論述、文化政治行動在1990—2000左右非常活躍，但在我進入研究所之後的時期，連文化現象的發生都跟著停滯。這與後續諸多論者批判的酷兒正常化，也與論述轉介、萌發的「歷史時刻」所發生的迴向效應有關。我們閱讀的所謂「西方理論」，引介到臺灣之後總是有所協商、有意為之；我們不得不讀、能讀能拿的，也反映了當時的歷史狀態與主體癥狀。2015年5月，在中央性／別研究室成立20週年的「性／別二十」會議中，我又被丟回到自己的「文化研究元年」，在荒蕪遍野的空蕩中提問。在一場回顧性反省的對話³中，丁乃非提起30年前的基進女性主義在臺灣「卡卡的地方」，是因為「搬來的知識資源必然來自另一個時空，那個時空自身的危機時刻（美國1960、1970年代）生產的論述」（85），再加上當時的閱讀書單反映的也有「知識青年的冷戰主體徵兆」（87）。會議當下我心情很激動，因為這是第一次有人正式地為自己思索了十年的問題，提出一個延宕了許久、自己也給不了的具體回應，而且是由我一直十分仰慕的學者（也是歷史施作者）的口中說出來。那時，我已經要進入博士班最後一年，走在完成博論的最後一哩路上。

其實決定讀博士班之後，我就已決定繼續找自己的答案；除了「為何西方」，我想要更進一步找到「其他參照」。但為了「回到亞洲」，我「去了美國」。我曾經想著要到英國讀文化研究（伯明罕大學或金匠學院），但礙於經濟問題，最後選擇了美國。在申請博士班時，我也要在「比較文學」和「亞洲研究」這兩個學科中做選擇；前者在美國十分具有文化研究內涵，後者則是要補充我的亞際弱項。最終我選了後者，並且在赴美前已在申請書上決定好要加入韓國比較。在此之前，在工作之餘，我

3 見：丁乃非。2016。〈歷史對話：性／別20年〉，收錄於《性別20》，何春蕤、甯應斌主編，頁81-107。中壢：中央大學性／別研究室。

已開始學習韓文、一年一次前往首爾訪問、參與性別運動，博士班前三年修課期間也是每日每日鍛鍊韓文。但我學韓文最重要的驅力是「想要知道更多韓國的事」，而且都是一些「非正典」的歷史。我不願將「學語言」看做更正當化「亞際連結」的必要因素，而是想強調「互相理解作為參照的慾望」，才是連結發生的時刻。但也正是學了韓語，我才有可能碰觸自己想處理的問題核心，才能掌握曖昧的、主流不承認的性少數自身的文化／認同操作。

但到了美國第一年，系上韓國研究老師剛離開學校，整個人文學院沒有其他人做韓國相關的研究；亞洲研究也大多以區域分專業，可以說是沒有學科訓練，也可以說很跨學科。在區域與方法都妾身未明之時，我將第一學期修課內容放在理論框架中，全都集中在「現代性」的問題上：我在比較文學系修了「現代主義與另類現代性」，在歷史系修了「歐洲東方與西方的現代性」，在母系修了「東亞現代性」。比較文學系老師做的是法國殖民主義與文學，歷史系老師專攻俄國史，母系老師一天到晚在批判我們所處的區域研究；我透過「現代性」這個大主題分別在他們身上釐清了「西方與其他現代性的問題」、發現「東—西之分也橫互在歐洲內部」，也看到了「現代性的普遍—特殊與殖民性」。那之後我明白了，與其說要擺脫西方，其實是要擺脫「現代性」內涵中的西方霸權（畢竟俄國、德國、奧地利等地也不夠現代）；更確切地說，是擺脫「現代性」本身作為知識生產權力系統所進行的劃界（時間與空間都是）工程。

第一年過後，我暫時先把「以誰作為方法」這個命題放在一邊，因為不管以誰作為方法，面對「現代性」都會有點「卡卡」的。也因此我決定鑽回歷史的「危機時刻」去找問題。原本博士班計畫寫的是戰後臺韓研究，那是為了銜接碩論處理的當代臺灣；但第一年過後我全力惡補的是由「現代性」命題回溯的19世紀末、20世紀初期的東亞。當然這也是美國亞洲系的體質使然：除了中國研究仍以前現代為主，日本、韓國、東南亞研究大多從前述時期開始；這確實也反映亞洲研究在美國，首先就是殖民、冷戰機制的產物。無論如何，我明白了從碩論以來的內在命題，不能不回

到「殖民」「現代性」的脈絡裡去梳理，因此第三年資格考前我已決定要將歷史時期拉回到1895－1937年左右這個區塊。至此，我琢磨出了自己所能掌握的理論（現代性與翻譯）與歷史（殖民現代化）框架，接著要面對的，就是經常被問到的問題：為何要比較臺韓？

三、不是比較，是「互為參照」

面對「為何要比較臺韓？」⁴這個問題，我經常要以為何「不」比較臺韓來回應。當然，在我（被迫）思考這個問題之前，已經有些「臺韓比較」研究存在。但我在此要強調的是，我想的問題不是「比較」，而是「參照」。也正是在「亞洲研究」這個學科裡，我得以從一開始對於「臺韓比較」的模糊認知，發展成一個屬於自己研究的框架方式。但這個因緣比較不是「受惠」，而是「受制」於亞洲研究。正是因為「亞洲研究」非常「區域」、非常「冷戰」、非常「民族國家」、非常「地緣政治」，臺灣與韓國研究根本就邊緣到不行。也正是這個學科的歷史遺緒讓我看到，自己從「文化研究元年」就配置的「亞際串連」有多麼重要。

「互為參照」(inter-referencing)的比較架構乃是源自亞際研究者對於「東－西二元」架構(East-West referencing)、「帝國權力的自我指涉」(self-referentiality)、以及「殖民者－被殖民者」之間單向連結(uni-directional reference)的思考。若以臺韓研究為例解釋上述三個地緣政治參照架構的話，首先要指出的是：臺韓不僅座落於以西方為優勢地位而被邊緣化的東方，亦處在東方各區域權力間的邊緣位置，因而能凸顯亞洲內部的權力差異；再者，西方的自我指涉傾向、同時也就是他者化的機制（如薩伊德 [Edward Said, 1925－2003] 所稱的「東方主義」），運作在「東方」使其自我他者化時，臺韓及其他亞洲區域間的比較研究將凸顯內部的異

4 比較文學系的老師後來成為我的口委，在一次見面討論時她曾經跟我表明，在法國殖民相關研究裡，也沒什麼（前）殖民地間的比較研究，大多還是「殖民－被殖民者」間的研究。

質性；最後更重要的是，當歷史解釋總被綁定在殖民關係中（如臺灣史等同於殖民史的論點），當被殖民者只能以自身與帝國間的縱向關係看待自身位置，殖民地間的參照研究可以鬆動此單向殖民歷史書寫的橫向結盟。

然而，以上三個既有的參照架構，亦解釋了「臺韓比較研究」在世界各地、乃至臺韓兩地學界的發展阻礙；即，這三個參照架構正是全球地緣政治的劃界系統，它們區隔（同時也建構）了帝國自身、東西、殖民等二元權力的地理配置，被殖民者（前殖民地）之間的關係也依此被區隔開來。這也部分解釋了北美東亞研究領域的不平衡發展（北美學者的權威性，中日研究資源最豐、韓臺研究則經常被邊緣化），以及為何臺韓比較（相對於中日、日韓、中韓、日臺比較）研究仍亟待補充，乃至當代臺韓社會之間在經濟、政治上的競爭與敵意。在這樣的條件下，當我以「臺韓互為參照」為研究方法時，為的不是處理這兩個社會與「西方現代性」、與「日本殖民政策」、與東西方帝國主義間的關係，亦非他們之間的「實質交流」與「異同之處」，而是要「並置」與「揭露」臺韓作為「『不』被想像的共同體」(unimagined communities)的歷史與現實，如何反映在「亞洲研究」這個學術現場。

當然，我所謂的「不被想像的共同體」是在回應安德森(Benedict Anderson[1936-2015] 1983)影響深遠的學術遺產——「想像的共同體」(imagined communities)這個概念。「想像的共同體」，作為政治國族主義的另類解釋，被視為是現代世界中的普遍現象。但這個概念也因其西方中心、過度自發、包山包海等傾向而受到批評，⁵批評者亦提醒不應將此概念套用，或認為其適用於各種不同的政治想像。無論「想像的共同體」是否

5 針對這些批評論點展開的討論，請見下列論文：

Chatterjee, Partha. 1993. "Whose Imagined Community?," in *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: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*, pp. 3-13. NJ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;

Hobsbawm, Eric. 1990. *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: Programme, Myth, Reality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;

Marx, Anthony. 2003. *Faith in Nation: Exclusionary Origins of Nationalism*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 °

airiti

有效解釋了全球乃至亞洲的國族主義建構，臺韓兩造之間從未在此概念中被理解。即使兩地皆為日本殖民地、在政治文化上同樣經歷同化、被規化為日本國（皇）民的歷史，兩地間只能透過殖民關係認識彼此，甚至透過殖民權力運作下產生競爭關係。要在臺韓之間想像一個「亞洲」共同體，必須解決互相看不見的歷史難題。

在上述前提下，我將「『不』被想像的共同體」視為一種政治介入，用以檢視並挑戰既有的民族主義想像基礎，將此狀態視為臺韓維持著「不被想像」的「共同體」基礎。更進一步，不只臺韓關係應當作為「不被想像的共同體」來重新理解東亞地緣政治關係，我更想將此概念推向理解臺韓社會內部的各種差異性存在。以我個人研究主題來說，臺韓社會內部各種「性少數」以及「女人」也被劃分為「不」被想像的共同體，他們的社會位置總是透過與主流正常化的「性」想像（即單一參照）被定義，彼此間也總是被各種權力系統（如殖民、父權、資本主義等）區隔開來。至此，我的博論研究計畫整個底定之後，我就想要趕快回臺灣。

四、去去去，去美國；回回回，回臺灣

冷戰脈絡中的「來來來，來臺大；去去去，去美國」，在我身上運作的遺緒還未清理完畢。然而，如果我認識到自身的研究位置乃是一個「後冷戰」主體，主動選擇進入到冷戰遺產的美國區域研究，發展出上述博論的歷程，則讓我更警覺到，知道要「以誰作為方法」還不夠，更要知道「『不』以誰作為方法」的歷史問題。也因此我從一開始就把就職目標放在亞洲，後來決定回到臺灣，選擇先以中文發表階段性的研究成果，而後進入臺灣文學研究所任職。這不代表我正在以「臺灣」作為方法，與其說臺灣，我念茲在茲的更多是性少數的問題，也是那些尚未能互相參照的各種主體。從性／別研究領域的思考走來，我更傾向一種「否定的」主體研究與串連策略，也是上述唸起來就卡卡的「『不』被想像的共同體」、「『不』以誰作為方法」的問題。由此展開，「不」被想像的不只是臺

韓，越南、菲律賓等地與臺灣的地緣歷史淵源還有待進一步參照與積累；同樣的，臺灣社會內部諸多還沒有被想像的、還被遺留在歷史中的「落後」主體（養女、娼妓、共產黨、障礙者、性變態等），也亟待串連、或互為方法。

直到此刻，我仍舊認為從文化研究襲／習來的「亞際連結」、是必要且有用的。「亞洲作為方法」或是近年的「華語語系研究」或多或少也打開了橫向連結的可能與累積，但我認為不應將研究起點設定為反對單一的「美帝」、「日殖」或「中共」，因為那依舊陷在單一參照的歷史難題裡。我們似乎還需要離開「東北亞」為中心的亞際思考。為了實踐自己的學術論題，我甚至在找到教職後開始學習越南語，即使要作臺越參照研究，對現在的我來說還遙不可及，但在越南語課堂上，我觀察到了臺灣如何想像自己與越南的關係：因應南向政策一起學習的同學中，有一半是公司要外派、想去越南發展的職業人士，以及相關組織的政府員工，另外也有喜歡越南文化、因為越南朋友而來學習的人，還有為了與自己班上學生的越南籍母親能夠直接溝通的特教老師。在官方政策、民間文化交往、新移民等議題之上，當然還有臺越之間的歷史連結（語言、戰爭、殖民等），讓這些當代議題得以發生。這是在臺灣才有的視角，也是臺灣自我認識的途徑。

「臺灣」因此對我來說有著不可取代的特殊性，也是文化研究了20年後的一個新命題。到美國走一遭、在亞洲四處走踏之後，我發現我的外國友人、同事們大多也不知道文化研究是什麼，不知道該如何定位臺灣。我就繼續保持這個否定的位置（文化研究「不是」……，臺灣也「不是」……）。但最終我還在學術領域，還在努力找尋方法問更「好」的問題，以回應這篇文章一開始的、屬於一個文化研究碩士生的焦慮：我除了讀西方理論，還可以讀什麼？我親身體會到了，還可以讀的東西很多、太多了。但為了尋找其他參照，你得立刻轉換到新的知識形構、甚至感覺結構裡。這不是說為了削弱西方影響，所以不讀西方理論，轉換到亞洲；而是透過對自身的批判，重組西方長久以來滲透進亞洲的知識形構、感覺結

構。更重要的是，這個命題不僅針對區域間的國際位階、知識重組，每個社會內部任何單一傾向的、霸權性的參照系統都應謹慎視之。

如在國際文化研究學會(ACS)第12屆雙年會獲頒斯圖亞特·霍爾獎(Stuart Hall Award)的勞倫斯·格勞斯伯格(Lawrence Grossberg)在感言⁶中提醒的：「文化研究總是催促我們，遠離『概而言之』的誘惑，去理解世界抽絲剝繭的情境性；它也敦促我們去尋找必然之中的偶然，簡單背後的複雜，以謙遜的姿態拒絕決定論的引誘」(156)。這個看似十分浪漫的理想，在當下能操作的其實就如「酷兒理論的奠基人伊娃·塞奇威克(Eve Sedgwick)曾提議的，左派要停止教導人們應該有什麼感覺，而開始試著瞭解人們實際上有什麼感覺」(162)。格勞斯伯格訴諸一種「關聯式」的提問，在要他人接受差異(種族的、性別的、政治的)之前，先問這些差異怎麼與他們發生關係，才能朝向感覺結構的理解與改變。我也切身感受到，從文化研究元年開始，我一直在學術系統裡學習的，其實就是在面對臺灣社會內部諸多複雜的群體、面對共同承擔著殖民黑暗歷史的亞洲鄰居，不要再以「西方」對待我們的方式理解自身，以「進步」(如此的現代化意識形態)之名理所當然地評斷他人。也就從這裡繼續前進，我會帶著屬於自己的新提問、踏入文化研究的下一個20年。

6 Grossberg, Lawrence (勞倫斯·格勞斯伯格)著，郝玉滿譯，羅小茗校。2019(2018)。〈意志上的悲觀主義，智識上的樂觀主義〉(“Pessimism of the will, optimism of the intellect: endings and beginnings”)，《熱風學術網刊》13期(2019年5月)，頁155-163。